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培文·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系列

GLOBAL

RIFT 全球分裂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下册]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

L. S. Stavrianos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 著

王红生 等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第四编 第三世界争取独立的斗争：20 世纪

第十九章 防御性垄断资本主义、革命与新殖民主义的时代 369

-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西方防御性垄断资本主义 / 370
- 二、颠倒的马克思主义 / 373
- 三、第三世界中的跨国公司 / 375
- 四、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 / 383
- 五、第一世界的反革命战略 / 387

第二十章 第一波全球性革命浪潮（1914—1939）：发轫于 1917 年俄国革命 415

- 一、革命在俄国 / 417
- 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 421
- 三、“资产阶级和沙皇乱七八糟的东西” / 428
- 四、“五年计划” / 431
- 五、苏联革命与第三世界 / 436

第二十一章 第一波全球性革命浪潮（1914—1939）：革命在全球范围的展现 441

- 一、第三世界的政治动力 / 443
-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 448
- 三、甘地防止印度激进化 / 453
- 四、中东委任统治地 / 457

- 五、巴勒斯坦大三角 / 465
 - 六、热带非洲 / 479
 - 七、南非的特例 / 491
 - 八、拉丁美洲的新殖民主义 / 495
- 第二十二章 第二波全球性革命浪潮 (1939—): 1949年中国革命的发端 507
- 一、中国革命 / 509
 - 二、“延安道路”还是苏联道路? / 519
 - 三、十年动荡 / 523
 - 四、后毛泽东时代 / 528
 - 五、中国革命与第三世界 / 533
- 第二十三章 第二波全球性革命浪潮 (1939—): 全球性革命现象 537
- 一、第三世界政治的动力 / 538
 - 二、民族主义政权 / 543
 - 三、社会革命政权 / 608
 - 四、白人移民政权 / 647
- 第二十四章 共同的认识 691
- 一、天下大乱 / 692
 - 二、全球性对抗 / 693
 - 三、“是让步, 还是进行结构变革” / 696
 - 四、共同的认识 / 703
- 参考文献 715

431 印度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潘尼迦曾把达·伽马 1498 年到达卡利卡特之后的几个世纪称为世界历史上的“达·伽马时代”。正如潘尼迦所说，这一时代的标志特征是“西方海洋势力支配广袤的亚洲大陆”⁽¹⁾，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支配整个非西方世界。差不多在达·伽马的探险之行五个世纪后，同样是一位葡萄牙人：波尔图大主教费雷拉已经意识到，葡萄牙的非洲帝国及其内部独裁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时，“达·伽马”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样说并不失公允。不但西方国家对其海外大陆的控制遭到粉碎，而且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还引发了葡萄牙自身的革命，结束了全欧洲最古老的独裁政权。

19 世纪第三世界的显著特征是其范围在全球扩展。非西方世界中只有先前白人定居的英国自治领、美国和日本帝国免受剥削和奴役的境地，实现了工业化，从而保持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而 20 世纪第三世界的显著特征却是其逐步解体。与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相反，第三世界却成了全球革命运动的中心。那些宗主国，为了防止帝国主义体系解体，采取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策略抵制革命运动（参见第十九章）。然而其殖民体系却逐步坍塌，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

432 第一个阶段截止到 1914 年，前面一章已经分析过。这一阶段是孕育期，各种自发的抵抗运动开始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不过这些远称不上革命。第二个阶段，从 1914 年到 1939 年，在 1917 年俄国革命（参见第二十章）的刺激下，形成了第一

次全球革命浪潮。然而，俄国革命并未像布尔什维克人期望的那样扩展到俄国以外的世界。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属于民族主义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个阶段肇始于 1939 年，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预示着革命浪潮的到来。与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者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寻求世界革命，然而却恰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维持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殖民帝国逐步解体。有些殖民地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完全独立。其他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政治自由但却依然受到外国经济控制——因此，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拉丁美洲国家自 19 世纪早期开始便一直受此控制（参见第二十三章）。

第三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全球革命势力和革命抵制势力的性质、力量和二者间的互动。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到底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标志阶段，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标志阶段，将取决于最后的结果（参见第二十四章）。波尔图大主教已经正确地认识到，当前与“500 年的历史决裂”的斗争是一次“精神创伤”。毫无疑问，它将会在接下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进程上投下自己的影子。

[注释]

1.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New York: John Day, 1954) , p.12.
-

当前的一系列发明意味着一场人类从未了解过的最 433
广泛的科技革命。无论是其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紧密程度
还是其速度，都远超新石器时期的农业变革和早期的工
业革命。

——查尔斯·斯诺（Charles Snow, 1966）



第十九章 防御性垄断资本主义、 革命与新殖民主义的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主要归功于机械工程师，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归功于工业科学家，而 20 世纪晚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却是在军用刺激下发轫。

纵观人类历史，备战促进了科技发展。众所周知，古希腊人从来没有兴趣把其科学猜想转化为实践，但是他们却发明了大型军用十字弩、喷火器和投石机。中世纪，火药随着前膛装滑膛炮和燧发枪的快速发展而用于军事。近代早期，巴黎一家食品店发明了食品罐装工艺，为法国革命军提供给养，拿破仑因此而给其颁予奖励。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领域把近期的发明应用于发展战机、坦克、有毒气体等新武器。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切都发生了质变——军事科技成为工业发展的助推剂。工业因而依赖于军事的副产品而发展，而不是相反，结果第三次 434
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迥异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既影响了宗主国也影响了殖民地。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和西方防御性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技对工业的影响格外直接，尤其明显。1945年7月16日，新墨西哥的沙漠上空腾起的蘑菇云，标志着人们掌控了原子能的利用，原子时代到来。与此同时，多次遭受德国“V-2”导弹轰炸的伦敦人亲眼看到了升空的火箭，这将导向太空时代的到来。而部署在英国海岸的高射炮群则配备有预测系统——就像电脑一样具有反馈功能，预示着控制时代一系列电子成就的到来。原子能、控制技术和推动太空探索的火箭技术，这三项战时的发明也成为第三次科技革命之“高新技术”的基础。

原子能的使用让人想起了火的利用。当人类在约50万年前学会使用火时，他们在火的应用方面很相像：确保阴天中的热量获取，没有月亮的夜晚来照明。之后他们才逐步掌握了火的其他用途，如烧饭、熔化金属、烧陶及驱动蒸汽机。同样，核能也从最初的军事用途逐步应用到其他领域，如核电站、核潜艇、生化研究，以及医疗诊断和治疗。

当代高科技的第二个主要体现：火箭技术，发轫于1957年10月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被送上太空绕地飞行，迎来了太空时代，其意义重大可直逼三亿多年前两栖动物首次从水下来到陆地上。而与之相似，人类现在正在探索生养他们的地球之外的地方。不过，鱼类需要数百万年时间才长出腹鳍和肺，从此这些器官开始发挥鳃的功能，而人类则可以借助器械在新环境中生存，因而不需要长期的生理进化。正因如此，才有了当前一系列发明计划：航天飞机，自动化医药空间工厂（可以生产各种疫苗和用于酶的探究方面的纯净的培养组织），自动化空间工厂（可以生产用于电路的几乎没有瑕疵的晶体），大型太阳能接收器（可以通过微波将太阳能发回地球上的接收站），建立太空殖民地（作为新的外太空探索计划的发射平台）。

435

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奥尼尔（Gerald O' Neill）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y）等科学家预测最终可在太空建立一个“人工生物圈”，可以养活100亿人，比目前世界人口的两倍还要多。事实上，他们认为太空移民不可避免，毕竟地球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他们认为，进军太空是自然而然之事，不可避免，就像达·伽马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海外殖民也随之而来。

当前科技革命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控制技术，具体来说就是计算机和自动化结合而产生的技术。计算机上包含的一些装置，可以超常规速度运行，并完成复杂的逻辑和决策任务，逐步提高人类操作这些事情时的能力，甚至在这些方面逐步取代人类。自动化主要指运用高度自动化的机械和流程，从而大大减少了人类劳动或具体的人工控制步骤。近年来随着超导体技术发展，机器的形体也在不断缩小，

自动化这一电子技术的综合领域也取得了快速发展。超导体（常见的有硅片）可被用来传输电流或切断电流。这也使它们成为电子计算机的理想部件——电子计算机正是通过电流的自动流断来工作的。将较多的电路连接在硅片上，它们就共同组成了以硅片为基础的微机，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微处理器。微机已遍布现代科技的方方面面，被广泛应用在核电站设备的操作、企业办公室、超市收银台、纺织厂、电话交换系统及工厂生产线等领域。菲亚特也开始在一则电视广告中有理有据地吹嘘自己生产的轿车是“由电脑设计，通过激光制动，且在播放一段《费加罗的咏叹调》的时间里就可由机器人手动组装完成”。

说完工业，再说农业，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给农业带来了深远影响。美国是微电子领域发展的先驱，同样也是资本密集的农业产业科技的前驱。而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发挥了重大的催化剂作用。战前，美国农场依然采取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尚未雇用季节工经营，大型农业机械、大量化肥、杀虫剂、除草剂也还未投入使用。而战争爆发后，农产品需求激增，价格也因此飙升。短短几年里，美国农业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从以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产业，聚拢发展成为由农业产业公司控制的经济门类。

这一转变之所以成为可能，离不开两个有益条件。一方面，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间，石油价格极其低廉，使得维持日益复杂的农业机械运转、生产大批量的化学产品订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发展，扶持方式包括提供直接的政府补贴、优惠税收待遇，还开展了耗资上亿美元的研发项目，专门援助农业产业经营而非家庭农场。 436

农业产业之所以处于优势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其非同寻常的生产力。其中一条常被引用的数据显示，如今1名美国农民可以养活48人。1920年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0.1%，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降为4.8%。不过，这些数据有误导因素——它们只反映了人力效率的提高，却忽视了同样较高的能耗和浪费。就拿玉米为例，每公顷产量的提高，杂交种子的贡献率为20%—40%，剩下的部分应归功于能源投入的提高，包括新型机械运转所用的燃料，以及生产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过程中所用的燃料。最终结果是，每生产一公顷玉米，就要消耗80加仑汽油。鉴于这一能源投入和生产效益比例，西方高能耗的农业生产体系成为历史上效率最低的之一。在亚洲的水稻种植体系中，单位卡路里的能耗可产出5—50卡路里的粮食。而在西方生产体系下，消耗5—10卡路里才能生产1卡路里的粮食。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总结研究报告同样值得注意，其中说道：“一个只需要一人操作的完全机械化的农业……总的来看，在技术层面是有效的”，大型农场的生产目的“不在于减少单位产量的成本，而在于增加销售额、提高产量、增加总收入”。⁽¹⁾

尽管有上述种种考虑，美国小型农场的数量还是在继续减少。它从 1930 年代顶峰期的 680 万户减少到 1980 年的 280 万户，而到 1985 年据估计会只有 100 万户。如今美国 6% 的农场正在生产美国 50% 的农业产值。这些大型农场大都不是由公司所有和经营。田纳克公司的一位发言人曾说：“农业是高风险产业，通常几乎没有任何利润可言，对大公司来说尤其如此。”⁽²⁾ 尽管也有一些为人熟知的农业法人合资企业，比如波音公司位于太平洋西北地区的马铃薯种植公司，不过主流趋势正在朝着合同式农业发展，具体来说就是公司与农民签订合同并告诉他们怎么做。1970 年，合同式生产的产出只占美国粮食产量的 20%，而到 1980 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 50%，到 1985 年有可能达到 85%。当前的农业产业粮食系统中，关键问题不是谁拥有农场，而是谁控制了农民。农民依附公司不仅仅是只通过合同方式，实质上公司垄断了燃料、设备、化肥、牲畜饲养、粮食加工和销售等在内的粮食生产链上的诸多重要环节，从而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民对公司的人身依附。

上述“粮食生产体系”与战前的“农业体系”毫无任何关联之处。大部分家庭作业模式下的农民背井离乡，扰乱了美国的农村社会结构。由于美国农业部资助研究项目，扶持农业产业科技发展，但却并未为家庭模式的农场经营提供科技支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农民被迫离开农场的的原因，他们只好拥挤在城市的贫民窟里，以至于如今看来吊诡的是，美国农业部的预算有很大一部分却要用来养活他们。许多农民涌向城市后，留下的美国农村社区社会生活贫乏、经济生活贫困。1974 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加利福尼亚中心河谷的两个社区，其中一个由大公司的各种分支机构控制，而另一个则由几个小型农场组成。与前者相比，后者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这里建有较多的公园、较多的可以从事零售贸易的小商店、包括道路和人行道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硬件交通设施，其拥有的可供居民自我提高和娱乐的机构组织是前者的两倍。这里有两家报纸，而前者则只有一家。总之，这个由小型农场组成的社区生活质量要更高一些。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深刻，波及速度更快。其影响并不仅限于那些最先生产出硅片、最先发展农业产业科技的工业化国家。几乎与其同时，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受到了影响，甚至是更具破坏性的影响。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城镇化实现了，但工业化却未实现，环境恶化，富国和穷国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第三世界内部穷人和富人的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三世界在 20 世纪成为全球革命活动的中心。而本身在技术上充满活力、积极进取的垄断资本主义如今却受阻而变为了防御性质，这是当今时代最为吊诡之事。垄断资本主义如今正式放弃了其海外殖民地，19 世纪开始的进攻性的殖民扩张主义也一去不返。如今它正极力争取通过新殖民主义方式，或是各种

各样直接或间接的活动去抵制革命运动，以间接方式维持统治。

二、颠倒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尚未开始，而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就早期的零星抵抗运动而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早期的革命运动是环境的综合产物，它们修正了马克思的断言：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会引燃全球革命的烈火。像19世纪的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家一样，马克思认为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的平衡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水平只够满足维持生活必需品和劳动力再生的要求，因此其国内市场必然有限。利润随之会下降，国内资本投资相应也无利可逐。所以资本和技术也就会自动从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这为后者发展的早期阶段提供了较高的收益率。马克思因而预测：随着这些传统工业化中心的衰落，革命将会在那里首先到来。不过，马克思也确实担心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将来可能会遭到一个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的外部世界的包围和威胁！1858年10月8日，他致信恩格斯：“目前的重大问题是：在欧洲大陆，革命是迫在眉睫了，一开头将采取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既然是在更广大的地区继续向上发展，这种革命是不是无可避免地将会在这一小地区被粉碎呢？”⁽³⁾

与马克思具有相同认识的罗莎·卢森堡指出，意大利北部城市的资本溢出推动了16世纪和17世纪荷兰的发展，而荷兰的资本也促成了英格兰18世纪的工业化。同样，列宁在其1917年所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一书中写道：“资本输出在那些输入资本的国家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生影响，大大加速了这种发展。因此，如果说资本输出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输出国发展上的一些停滞，那也一定会有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作为补偿的。”像马克思一样，列宁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崛起的新中心输出资本和技术，结果必然是正在走向衰落的传统的工业化中心会最早爆发革命。

不过，列宁在去世前不久认识到，他先前就革命所做的推断无法再被证明。在1923年2月最后的一篇口述文章中，列宁问道：“……如今在我们的小农生产方式下，我们国家〔苏联〕百废待兴，难道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坐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不过它们不会像我们先前所期望的那样完成这一发展。它们走向社会主义不是靠社会主义逐步走向成熟的模式实现，而是通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剥削实现，通过掠夺那些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中首先被打败的国家和整个东方国家实现。”之后，列宁以其独特的洞察力总结道：

439

最终斗争的结果将取决于这一事实：俄国、印度、中国等，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正是这些占绝对多数的人口在过去几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卷入到斗争中；因此，对世界斗争的最终结果我们不应该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就此来看，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确定无疑的。⁽⁴⁾

20世纪第三世界的历史塑造，应该归功于列宁这灵光一闪的先验洞见。革命并未发生在期望的中心而实则发生在了边缘地区，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由于两个因素所致。一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在赢得选举权、获得在工会中集会的权利后，权力增加。他们的工资，如英法两国的工人工资，在19世纪下半叶翻了将近一番。随着工资水平不再被局限于用来满足生物再生产，大城市中心的国内市场大幅扩展。随之而来，工人更感兴趣的自然是福利而非暴力。

这一趋势又由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作用的加强而维持了下来，这些国家都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社会民主党，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共产党，都放弃了他们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之愿景。因而，他们选择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改革来提高劳动力地位。为此，他们接受了世界被划分为剥削中心和受剥削边缘地区这一现状，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剥削中心的劳动力相对富足。

这也引发了第三世界革命运动背后的第二个因素，即宗主国地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此时第三世界的情况却在不断恶化。这两种倾向，对比明显且相互关联。垄断资本之所以能在国内支付较高的工资，恰恰得益于它们在边缘地区加大了剥削程度，从而能够获得较高利润。因此，1873年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转变，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说，有利于那些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宗主国家，而不利于那些输出原材料的边缘地区。西方资本和技术的利用，大大提高了海外种植园和矿山的440 生产力。然而，由于没有政治权利，没有工会来维权，加上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第三世界的工人并不像他们的宗主国同行那样在生活水平上有实质性提高。此外，工资水平并未增加，购买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成本却在增加，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剪刀差中。而且，随着宗主国地区垄断行业的增加，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再受竞争因素决定，因而大幅提升。

以下数据揭示了第三世界国家贸易关系的恶化程度。1800—1880年间，英国的进出口交换比率不断下降，其指数从1801—1803年的245，下降到1843—1846年的118，接着又下降到1848—1856年的110，到1880年这一指数已经下降到100。因此，到1880年，英国若想获得与1800年同等数量的原材料，必须出口1880年2.5

倍的工业制成品数量。然而 1880 年后情况却发生了逆转，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开始下降，从 1896—1900 年的 163 下降到 1926—1930 年的 120，到 1938 年降到了 100。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相同数量的原材料，能换取的工业产品不到 1880 年的 60%。联合国一项名为《欠发达国家进出口相对价格指数》的报告指出，1876—1948 年间，原料出口国的进出口交换指数下降了 35%—50%，这些国家在出口原材料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第三世界中的跨国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和跨国公司（MNG）的出现，使得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由来已久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跨国公司把农业和工业方面的高科技从第一世界引入第三世界，在此方式下，两个世界之间的差距变得尤为明显。

农业方面，从本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美国农业生产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到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量大的粮食生产系统的转变，农业产业公司垄断了从粮种、化肥、杀虫剂到粮食加工和销售的所有生产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新的粮食生产模式迅速扩展到海外，取代了传统的家庭农业模式，就像之前在美国发生的那样。农业综合产业的支持者断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解决全球粮食生产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矛盾。

美国农业体系向海外扩展的过程通常称作“绿色革命”。但在“绿色革命”向第三世界扩展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第三世界农民的利益，就像之前没有考虑美国农民的利益一样。比如，在墨西哥，97.7% 的玉米地和绝大多数的小麦种植地都是旱地。墨西哥一研究组织“农业调查研究所”开启了一项研究项目，提高玉米和小麦种子的质量，以应用于小型旱地农场。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们一出现，他们的努力就搁浅了，那些科学家们注重改变种子基因，并配以施肥灌溉来提高产量。培育出的新种子使得墨西哥实现了小麦自给，然而真正的受益者却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土地所有者——施肥灌溉的成本对他们来说不过九牛一毛。随着大型农场商业化之推进，墨西哥大部分农民不是失业就是转向其他行业。

尽管如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他们在墨西哥“成功的”实验项目却是感到欣慰。它建立了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并建立了八个地区研究机构。在美国国内市场饱和、环境恶化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关注的时刻，这一制度安排为美国的农业机械和农药开辟了新的市场，美国公司也从中而受益。比如，在菲律宾，埃索标准化肥和农业公司于 1960 年代开设并运营了 400 家农业服务店。菲律宾政府为农民购买粮种、化肥和农药提供补贴，并组建了一支由政府人员组成的销售团队。埃索公司进军农业领域，政府则保证向愿意购买埃索产品的农民提供补贴，从而保证了埃索公司的

利润收入。

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是“绿色革命”的桥头堡，然而如同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菲律宾也迎来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最根本的问题与墨西哥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三个国家70%—90%的农民无法灌溉农田，几乎没钱购买化肥。印度农业部长莫汉·拉姆（Mohan Ram）于1969年概括了这一情况：

“绿色革命”的受益者是那些享受特权的少数农场主，他们的经营规模较大或至少处于中等水平。3%—4%经营规模最大的农场主取得了所有政治影响力，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在与政府的协作中作出所有决策，攫取政府专家资源，掌握了他们所有的技术知识来为自己服务，而贫困农民得到的却是少之又少……富裕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一直在不断加强和巩固……大地产者正试图除掉（必要时甚至会动用武力）那些分层制佃农和先前的雇耕农，以求自我经营或是雇用农业劳动力进行耕种，榨取土地效益。⁽⁵⁾

“绿色革命”带来的效果，与先前预期的给农村地区带来繁荣和稳定恰恰相反。土地改革本是大幅增长、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绿色革命”先是搁浅了这一目标，最终则抛开了这一议程。在“绿色革命”的刺激下，少数能用得起新农业科技的农民采取了无需过多劳动力的商业化经营模式。随着商业化的推进，本就近乎失业的农村下层农民纷纷涌向城市贫民窟，在那里他们发现自己和先前在农村时同样是“多余的”。这一新的城市低产阶级如今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城市的主要人群。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物质财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些评论人士据此预测，“绿色革命”最终将会成为“红色革命”的前奏。

“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同样给第三世界农业带来了破坏性效果。在该计划下，1954—1980年间，价值近300亿美元的粮食被提供给130多个国家。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这一援助是人道主义援助，是来帮助那些贫困国家的。然而实际上，1954年的《农业贸易与发展法案》（480号公法）却是旨在“推进美国的对外关系”“提高美国农业稳定的经济效益，提高国民福祉”。直到1961年，法案在进行修正时才加上了“在全球范围内与饥饿作斗争”这一目标。

朝鲜战争后，加强“美国农业体系稳定”这一需要变得尤为突出。时任美国农业局主席提醒到，剩余粮食囤积“会损害我们的经济，除非我们能够找到足够的市场来维持继续生产”⁽⁶⁾。480号公法在寻求所需市场上也很成功。在“粮食用于和平计划”实施的头12年里，美国25%的出口农产品都受益于法案所给出的优惠条款。然而美国粮食如同洪水般的涌入，使得接受国的粮价大跌，当地农民根本无法与其

竞争。最终结果便是当地粮食生产遭到损害，这些国家日益依赖于美国的粮食出口。代表美国粮食产业的贸易机构在当地的的活动则又加强了这一模式，它促使当地民众养成美式饮食习惯，并可利用出口粮食换来的当地货币援引 480 号公法条款来推进它们的活动。因此，在当地民众的饮食方面，鱼逐步转成汉堡，米饭换成面包，当地的饮品也变为美国软饮。

480 号公法开拓了市场，搁浅了第三世界的粮食自给计划，其成功之处并不仅限于此。它也实现了法案的另一目标：“推进美国的对外关系”。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最早拥护者之一，他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会议上（1957 年）明确认同这一成就，并为之欢呼：

我听说……他国民众也会因粮食而依赖于我们，对他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我却是，因为人们在做其他事之前首先得吃饭。你要是想找到个方法让他人在与你的合作中倾向你、依赖你，在我看来，似乎粮食依赖再好不过了。⁽⁷⁾

里根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John Block）在 1980 年的一次听证会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粮食是武器，不过使用它是为了让他国与我们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更不愿意让我们失望了。”⁽⁸⁾ 由于出现了一些不利报道，布洛克几天后改变了他的说法，将粮食重新定义成是“为了和平的工具”，尽管他心里可能并不会认同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力没有提高，毕竟有新的粮种出现，化肥和机械也投入了使用。然而，生产力日益提高，受益者却非农民，他们甚至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先前还要糟。用于出口的粮食作物急剧增加，用于维持生存的粮食作物却在减少或停滞不前。比如，1964—1974 年间，拉丁美洲出口作物人均量提高了 27%，而同一时期维持生存的人均粮食量却下降了 10%。这就又回到了 19 世纪的模式，殖民主义者扩大作物生产并不是为了当地民众，而是为其自身出口以换取利润。比如，在法国殖民地越南，1860—1931 年间，40% 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用于出口的咖啡、茶、橡胶及稻米。这直接导致越南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了 40%。这种农业产业经营模式近来在第三世界广泛扩展，带来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与之相伴而生的却是第三世界营养不良状况继续恶化，这实在是一种畸形现象。197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长期以来世界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急剧上升，已升至 4.5 亿。而同年，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则显示，全球粮食人均生产量比 1960 年代初提高了 27%，在人均收入最低的 49 个国家，这一比率甚至高至 40%。

墨西哥是受美国全球范围内扩散其农业产业生产模式之影响的典型例子。墨西哥富裕农民与美国农民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他们种植相同的杂交种子，从相同的公司购买机械、农业和化肥，从相同的银行借贷，将作物卖给相同的公司。他们出口的蔬菜占据了美国市场的60%，然而墨西哥无地农民的数量却从1950年的150万增加到1980年的500万。尽管美国也在进口墨西哥的草莓和冬季蔬菜，但是无地的农民却不得不非法或合法地涌入美国去找工作。在地球另一端，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印度。1956—1978年间，印度粮食产量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了50%。然而同期人均粮食消费量却在下降，致使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换句话说也就是，农村家庭月收入不足8美元，城市家庭月收入不足9美元。

粮食越来越多，挨饿的人也越来越多，将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也就揭示了第三世界前所未有的移民城市现象。1950年雅加达人口为170万，1975年增长到550万。1900年的内罗毕还不过是一个2000人的小村子，1980年其人口已达100万，而且到2000年很可能会增长到400万。1980年墨西哥城的人口已经达到1400万，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然而在接下来20年里很可能还会再增长1400万。这种类型的城市化并非与工业化相伴而生，这些新来者不得不去做一种不至于使自己饿死的工作，但却对国民经济没有丝毫贡献。他们只能是在街头摆摊，沿街叫卖，擦鞋，做点帮人跑腿的活儿，推手推车，或者是蹬三轮车。

工业化程度的不足，表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扭曲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发展进程，也扭曲了其农业发展进程。正如第十三章中指出的那样，海外殖民地的工业化在殖民时期严重受阻。发达国家给出的政策理由是，继续出口原材料会扩大第三世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规模，进而提高其人均收入，创造出用于教育和社会服务的资金，最终在殖民地催生出类似于宗主国那样的发达现代社会。

然而，大萧条的发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第三世界国家重新评估上述假定。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原材料价格水准大幅下跌，致使第三世界外汇储备短缺，因而无力购买工业制成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全部投入军工生产，不再出口消费品，上述困境进一步加剧。第三世界国家不得不在出口原材料的同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作为补充。它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方式包括：对工业制成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为国内企业提供低廉贷款，政府建设必需的工业基础设施，政府通过各种发展机构和开发公司参与工业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和朝鲜战争的需求刺激了经济繁荣，这使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相信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长期可行的战略。拉丁美洲是最早采取该战略的地区，最开始一些年里，确实逐步发展出一系列产业，看上去正在走向自行加工当地的原材料，减少对外资和外来制成品的依赖，进而保持长期经济独立的过程，而